

海德格尔与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之比较*

□ 庞丹¹, 韩魁武², 白丹³

[1.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2. 大连 65053 部队 5 大队, 大连 116039; 3. 沈阳理工大学, 沈阳 110006]

摘要:海德格尔和杜威都具有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但二者在技术哲学领域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受到人们的忽视。通过从技术的涵义、本质、技术奴役问题的根源以及拯救之路等方面对两者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杜威的科学技术及道德拯救之路较之海德格尔的“诗”和“思”更具现实可行性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海德格尔;杜威;技术哲学思想

Abstract: Both of Heidegger and Dewey have plenty of technical philosophic thoughts, but their positions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philosophy are different, and Dewey's pragmatism philosophy is often ignored.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study of their thoughts from the aspects of root of technical connotation, essence and technical slavery problems, this paper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Dewey's scientific technology which is the method of morality redemption has more feasibilit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an Heidegger's "poem" and "meditation".

Key words: Heidegger; Dewey; technical philosophic thought

中图分类号: B71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289(2006)05-0675-04

作为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大师级人物,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都具有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然而二者在技术哲学领域中的地位却迥然不同。本文试图从技术的涵义、技术的本质、技术奴役问题的根源以及拯救之路等方面对二者思想加以比较研究,从而搭建起对话的平台,在比较中加以鉴别,呈现他们各自的思想精华,以飨读者。同时,也希望能进一步引起人们对杜威的技术思想的重视,从而客观公正地重新审视其思想,真正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一、相同的贡献,迥异的地位

海德格尔和杜威对于技术哲学学科的建立都具有重大贡献,但前者被奉若神明,门庭若市;而后者却倍遭忽视,门可罗雀。具体言之,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对技术哲学学科的建立功不可没,其原因有三:第一,海德格尔以实践取向取代理论取向,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很详细地描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首先是一种操作的关系,其次才是认识观照的关系;第二,海德格尔充分认识到技术具有一种起支配和揭示作用的本质,他提出技术也是真理的开显

方式,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第三,海德格尔是第一个把技术提到哲学最重要位置的哲学家,他说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由于强调技术是一种现象,是构成现代性中较本质的东西,因此,正如分析哲学支持科学哲学那样,现象学的哲学传统给了技术哲学以强大的哲学背景的支持。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伊德认为:“技术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可以说根源于海德格尔的著作。”^[1]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技术哲学家都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将技术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的。

尽管杜威对技术的评论是其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的一项事业,并体现于诸多文章及著作之中,但是与海德格尔相比,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却不为人们所重视。有关调查表明:对于杜威,人们通常并没有把他作为技术哲学的创建者来加以解读。事实上,直到1952年杜威去世后,美、欧的专业哲学家才开始系统地思考技术问题,并组织协会以促进这种研究。而且,有关技术哲学的文集中也并没有包括杜威的文章,至多他的有关这个主题的论著散见于少数的几篇文章中^[2]^[4]。虽然通过常用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检索,人们会发现杜威在美国远比海德格尔享有盛

* 收稿日期:2006-03-15

作者简介:庞丹(1976-),女(满族),辽宁抚顺人,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沈阳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技术哲学、西方哲学研究。

誉,但是如果检索 2002 年 6 月 22 日的有关近 30 年(1972—2001)的哲学家索引,人们将发现,涉及杜威的只有 1 321 条,而涉及海德格尔的则有 4 457 条。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在技术哲学家心目中杜威受到冷落而海德格尔较之更有声望?美国杜威研究中心主任 L. 希克曼教授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杜威本人,他没有将其技术评论思想集中于某一部著作之中;另一方面在于杜威的学生及其信徒,他们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被杜威称为“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版本正是其终生对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媒介所进行的评论。而邦格曼则认为哲学家热衷于海德格尔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的,其中原因之一是虽然二者都对技术与艺术加以了论述,但是杜威的表达模糊了他对现代技术的评判的轮廓,其灵活多变的论述进一步掩盖了他所关注的现象的地位和特征。而海德格尔在其职业生涯中自始至终将其思考集中于令人难忘的词句,任何熟悉他的人都能够当场说出他对技术的讨论是围绕着“座架”这个轴心而进行的。另外,二者具有不同的性格:杜威极为公正、体面,以致于他对任何问题的阐述都是合理的,他从未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人;相反,尽管海德格尔也具有相似的性格,但是他居高自傲,而且过于悲观失望。

尽管海德格尔和杜威在技术哲学家心目中具有如此相异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二者都具有丰富的有待于进一步挖掘的技术思想,他们对于机器大工业时代和技术时代的技术特征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都论及技术奴役及其消极后果。在那个地球生存问题还尚未完全暴露的时代,他们的思想无疑都具有超前性。具体而言,海德格尔处于人类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时代,技术对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他认为技术的统治是大工业时代的根本现象,他把他的时代称之为“技术的时代”。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海德格尔在其哲学生涯的晚期走向对技术的追问,技术主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中日益凸显出来。相比之下,虽然杜威也是少数较早地关注技术的哲学家之一,他在肯定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科学技术的消极后果,并对之加以论述。但是杜威所生活的机器时代和海德格尔所生活的技术时代在技术化的广度、深度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总之,在关注技术这点上,杜威和海德格尔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在这些相同相似之中也存在着相异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之处。

二、不同路径的技术追问

海德格尔在本体论层次上对技术加以追问,他在对技术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历程中首先从词源学的独特视角对“技术”一词作了细致的考察,并提出了关于技术本质的独创性见解。据海德格尔考证,“技术”(techne)一词来自希腊语 technikon,其原初含义就在于揭去遮蔽,实际上是一种解蔽(aletheuein, das Entbergen, revealing, disclosing)。

海德格尔说:“解蔽贯通并统治着现代技术。……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种促逼(Herausf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3]933}在促逼的方式中,人摆置(stellen)着自然,并订造(Bestellen)着自然,而摆置聚集起来,就是“座架”(Ge-stell),“座架”是现代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所说的某种东西的本质,是使这种东西能够持续的内容,是这种东西存在并活动着的方式,讨论某种东西的本质,就是讨论这种东西的存在和发展。那么,何为座架?海德格尔对此有专门的论述:“会集起来的强求(这种强求使人和存在相互涉及,以至于人和存在交替地相互限定)的名称叫作座架。”^{[4]88}它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对自然的支配和强制;另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和强制。在技术的座架的命定中,海德格尔强调说,“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所控制不了的东西”^{[3]945},人被座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在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对于技术控制的后果海德格尔是持悲观态度的,他不赞同对于现代科学和技术惯常的乐观主义的态度,不是将其片面地理解并阐释为绝对革命的和进步的力量,而是将之理解并阐释为蕴含着巨大的负面价值和力量的存在物。他所阐释的正是人在被技术所奴役时,要求重新“回到生活世界”的现代性境遇。他运用“无蔽状态”的概念,在解蔽意义上追问技术之本质;他运用存在论方法(实际也是现象学方法)来揭示“技术时代的危险”,这与胡塞尔试图用“生活世界”的概念、先验现象学的方法来拯救“欧洲科学危机”同出一辙,二者也都不免与更早期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所倡导的哲学应该回到现实生活中去的思想殊途同归。略有不同的是,虽然海德格尔和杜威对技术的批判是对当代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发出的重要的预警,但是,就其在同时代和以后时代的思想家中产生的影响而言,前者远比后者更为重大。

杜威以工具论而非实体论的观点来看待技术,其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反对本质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因此他排斥技术的本体论地位,而没有给出某个单一的技术定义。他所指的技术通常是“科学的技巧”,即无论其发生于工业和工程中,还是发生于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实验室中的使用工具、仪器及实验技巧的科学方法。在他看来,理论也是一个人工造物。因此,人们所谓的“理论研究”、“纯学术研究”实际上都是技术,正如他所说:“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5]技术就是制造人工制造物的过程,这种人工制造物既可以是无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科学、语言、法律、概念等,其中语言是工具的工具,它们都属于广义的工具范畴)。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它们也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被使用。因此,有形工具和无形工具之间的区别是功能上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杜威强调应在不同的背景中理解技术,例如:技术可以指对生产性技能的积极使用,它也是最令人满意的探究方法,或者是工业艺术品,或者是

使伽利略时代的科学革命有别于其之前的科学的标志,或者是对包括作为工具的的工具的语言在内的工具的普遍使用,或者是指涉工商业,或者是作为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或者是实现人类特有的社会和政治目标的计划。而且,技术远不只如上所述^{[2]58}。

三、相异的技术问题根源说

海德格尔在对技术的追问中发现,技术尽管是此在的解蔽方式,但是,技术却出现了对此在来说不可忽视的“危险”。缘何本来是出自对此在的解蔽的技术,反而又成为此在的“危险”?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何在?是技术本身吗?不同学者从各自角度对海德格尔的回答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座架对世界的破坏,现代技术的强求性要求割断了与其他展现的联系,使世界受到了统治和破坏,也束缚和改变了作为技术主体的人,使人只着眼于技术活动而放弃了人应有的其他思想和行为,成为一个完全的技术活动者,即变成了只限于从事技术活动的单一的技术人。这种强求性要求对存在和人的这种作用,实质上是对世界的破坏,它导致了现代技术奴役的产生,它对整个世界的破坏将使存在者失去灵性,使人类失去自我,也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家園。由此可见,座架对现实物的破坏是技术问题的根源。

另有学者认为,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最高的危险在于技术革命能用一种方式去束缚、蛊惑、迷惑和蒙蔽人,即算计的思想作为惟一的思想在活动并起作用,完全支配和控制了人。在算计性思想的支配下,人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提升为自然的主人,然而,人的本质不在于充当一切存在者的主宰,而在于“看守存在”,看守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地球上诗意般的栖居,以使人类不至于丧失生存的家園。海德格尔有一个怪异的命题“科学不能思”^{[3]1209},“在我们这个最激发思的时代,最激发思的东西出现了:我们尚未思。”^{[3]1210}他这里所说的“思”是与“算计之思”相对抗的“沉思之思”,是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思维。形而上学的思维是表象性思维,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算计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把一切都看作对象,在这种思维方式的驱使下,一切都是对象性的。在他看来,现代技术的孕育、勃兴、虚无主义化以及技术异化现象的出现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连续作用的结果。可见,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是与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批判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建立在遗忘中的存在的真理的命运……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4]120}技术揭示事物的方式并不是从现代社会中产生的,而是始于从古希腊开始的“生产性形而上学”,而现代技术则是“原子时代的形而上学”^{[3]827}。他认为,危险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框架本质,是蕴涵在技术中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现代技术身上折射出危及生存的一系列问题,但海德格尔并不是看到了现代技术对

人的潜在的及现实的危害而对世人发出理性的警告,他的技术批判旨在克服形而上学,寻找哲学发展的新方向。而拒斥形而上学也是杜威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也正是杜威所极力反对的哲学范式。显然,海德格尔实际上要批判的,正是杜威已经批判过了的东西。

还有的学者指出,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时代,一方面现代技术深入到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人类在利用技术的同时也深深依赖于技术,离开技术人类将寸步难行;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自己智力的盲目自信导致的对技术的滥用,产生了一些人类技术至今无法解决、也无法很好解决的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问题。可见,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奴役引发的问题归结为技术,他对技术的这种消极作用的深刻批判无疑具有一种人类学的深切关怀的意义,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逻辑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的,技术对人的奴役的最基本的原因并不是技术有一种“原罪”,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于技术成了资产阶级攫取利润、获得霸权的工具,在于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奴役。海德格尔的这点不足恰恰被杜威加以了弥补。杜威曾明确指出,技术奴役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于人对人的奴役。在这点上马克思和当代技术哲学家费恩伯格也有共识。马克思曾认为,从整体上说,技术本质上只是一种工具,是中性的工具,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才导致了技术对人的奴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各有其合理性,我们应综合加以把握,以期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引发技术奴役问题的作用机制及原因。不仅要在哲学层面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和追问,还要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人类的能动创造性;不仅要认识世界,找出问题所在,更要改造世界,尽力避免或者克服技术奴役问题。

四、悬殊的拯救之路

由于海德格尔和杜威在对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奴役问题的根源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因此他们对拯救道路的看法也存有差异。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不思维,人类迄今为止干得太多想得太少,问题出在“思想”领域,那么解题的思路当然要在思想领域中寻找。他认为克服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并不能通过技术本身来实现,事实上它注定要把事情弄得更糟,而只有对作为现代技术本质的座架的领悟、沉思与体察才能提供拯救的可能,其出路在于“思”与“诗”,在于对技术的“泰然任之”。人们应转换思维方式,走出形而上学的“算计之思”,走向“沉思之思”。“沉思之思和计算性思维一样不是自发的。沉思之思有时要求一种更高的努力……它更需要精益求精。它也还必须耐心等待,向农夫守候种子抽芽和成熟那样。”^{[3]1233}只有在思和诗中,在艺术作品中,我们才能超越“在场”的东西,让“开花的树”站立在原来的地方,对事物“泰然任之”。海德

格尔在寻找拯救途径之时把其归为“思”，反映了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

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毋庸置疑是十分深刻和犀利的。但是，他把“思”和“诗”作为解决技术奴役问题的途径，使他和和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一样，对技术的批判仍然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解构”，局限于精神领域的呐喊，而缺乏经济、政治、社会伦理层面上的批判，所以他们的批判最终不过是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式的词语“革命”，而不懂得实践批判的意义。“沉思之思”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警示生活在技术时代的人冷静地审视其行为的可能后果，但它却无助于技术异化现实问题的解决，所以海德格尔的技术拯救之道仍然充满着形而上学性。而且，他的态度是无可奈何的，“泰然任之”和“向秘密而敞开”，其实是一种无益于解决任何现实矛盾的“精神胜利法”^[6]。如卡尔·米切姆所言：“首先，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信守苏格拉底传统的哲学家，善于提出问题，而不提供答案。他认为，哲学研究的是问题、谜或难题，而不是其他什么事情。他不希望像实证主义者那样解决问题，或者像卢德威格·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一些分析哲学家那样消解问题。事实上，海德格尔对一切回答或解决是很怀疑的。”^[7]这段话对海德格尔克服现代技术中的问题的态度给出了最好的说明。笔者认为克服现代技术非但离不开人，反而主要是由人来实现的，是人充分发挥其主体能动性、遵循某种行为规范来实现的，离开了人的能动主导作用，所谓表现和显示以及求解任何问题既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如前所述，虽然海德格尔对“思”与“诗”说了很多，但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却置之不理，因为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批评的目标，这就凸显了他与杜威的思想的根本区别。他没能像杜威那样，在更深的层次上把现代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并进而揭示技术奴役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杜威看来，正是因为技术奴役的根源在于其资本主义应用，所以要避免这种负面效应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就是要将已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领域，而且问题的“解救”之道只能存在于现实的人类活动之中。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是，杜威并未过度关注技术对人的威胁，相反，他充分认识到技术在人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杜威同时尤为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他认为道德和价值是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而且道德在规范技术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这种道德拯救的力量似乎正开始显示自己的作用。世界范围内的反核运动和绿色组织的发展以及对克隆人技术、基因技术的限制性声明，已经对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单凭道德呼吁去克服技术奴役问题是不可能的，如美

国人拒签《京都议定书》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因此，在现实面前，单纯的“善良意志”不免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完全奏效。可以说，这种道德归宿的拯救之路正是许多当代“人本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所倡导的，这条路径不能说是无意义的和不重要的，然而其不足在于，它忽视了技术的社会属性，没有从技术与人的本质联系这一理论高度去探究技术异化的根源，因此不可能给出克服技术异化的正确方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继承、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然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则导致了人为的技术异化。因此，克服技术异化应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入手。

同时，仅站在人文技术哲学这个角度，只从一些外在的方面来寻求拯救之路也是远远不够的。的确，不管是向自然界索取资源进行物质生产，还是向环境排放废物，都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更应该从技术本身，从既是对象和结果，同时又是活动和过程的技术本身来研究技术，来探寻更多的解救之方；更应该结合实际来建构技术，通过道德法律的合理约束、国家权力的正当干预、社会舆论的有力监控及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和科技共同体的自我规范等，形成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确保技术的健康发展及其积极意义的发挥。这样看来，杜威的科学技术及道德拯救之路较之海德格尔的“思”和“诗”更具现实的可行性，因此对于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Ihde Don. Instrumental Realism[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48.
- [2] Hickman L. A. John Dewey's Pragmatic Technology [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德]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孙周兴, 编选. 上海: 三联书店, 1996.
- [4] [德] 冈特·绍伊博尔德. 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 宋祖良,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5] [美] 杜威. 杜威五大演讲[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9.
- [6] 邓晓芒. 什么是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一个比较[J]. 哲学研究, 2000(8): 59-64.
- [7] [美] 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殷登祥, 译.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7.

